

潘光旦选集

潘光旦：一件影像与文字

潘光旦的著作

潘光旦的教育思想

潘光旦的著作与教育思想

潘光旦

潘光旦

潘光旦

潘光旦的著作与教育思想

潘光旦的著作与教育思想

潘光旦的著作与教育思想

潘光旦的著作与教育思想

潘光旦的著作与教育思想

《中国之家庭与社会》

中国画家的分布 移植、与遗传

近代苏州的人才

关于人才问题

国家谱学略史

国家谱学

国家谱学

国家谱学有什么意义

说伦字

说伦字

说“五伦”的由来

潘乃谷 潘乃和 选编

明日报出版社



潘光旦选集

第一集

潘乃谷 潘乃和选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潘光旦与新人文史观(代序)

胡寿文

一 人文相映

潘光旦先生是一位社会理想类型的学者,他的斐然成章的文字处处牵挂着和人生休戚相关的各种实际问题。他早年在美国读书时主修动物学和优生学,回国后执教于各大学,讲授多种社会学方面的课程。他一生攻苦食淡,用生物学的眼光盘诘人类社会。早在30年代,潘先生就热衷于提倡用生物的现象或原则来探讨人类的社会文化问题,他相信“越探讨得进一步,便会越感到生物因子的不可轻视。”潘先生研究社会问题,一贯主张去蔽和会通。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在治学上坚持严肃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根本上还是由于他的文化的生物观是以囿囿的人的科学为基础的。在他的眼光里,所有的人都从祖先那里嗣承了种种生物的品性和文化的遗业,而在继往的同时,又都有无穷无尽的长远广阔的前途,在时空上互相贯通,无边无际。既然他立志把囿囿的人的社会当作自己的研究目标,则博览古今,兼蓄并包,就成为势所必然的了。可惜潘先生在世时的中国,科学幼稚,闭关自守,以致嗣响无人。所幸的是,潘先生留下了丰富的著作,使后来者可

以有所遵循或借鉴。

潘先生的作品涉及的领域相当广博,人才、性别、婚姻、家庭、民族、宗教、哲学、历史、教育、政论等等不一而足。总起来看,大体不离用生物学的眼光评价各种文化势力和探讨它们对于文化盛衰的影响。他的大部分文章虽然对优生学情有独钟,但却又远远超出了它的范畴。他毕生萦萦于怀的是中华民族在人类进化历史中的位育问题;这是贯通全部人类文明历史而又与人生休戚相关的通才之学和实用之学。浸润其中的学术思想和理想的头绪众多,主要有古人文思想;生物位育论(生物进化论);社会文化的功能学派;实验论与工具论;人的科学。潘先生认为,这五个头绪,彼此间既很有一些渊源,或一些殊途同归的缘分,迟早是会融会在一起,而成为一个簇新的汇合的。这新的汇总得有一个名字,他称它为新人文思想。潘先生言动安详,为人宽厚,豁达大度,而且富有锐意进取的精神;他提倡重人道的 new 人文思想,真可以说是人文相得益彰。他不顾身体上和社会上的种种常人难以克服的残障和劫难,终身勤学苦读,笔耕不止,以风流的文采,开辟了纵论中和位育的新人文史观的端倪。他的许多独到的见地,使人振聋发聩,大开眼界。当然,在他所得出的许多结论中,大家也将会发现有些是错了的;如果我们考虑到一面是研究立意的深长,一面是科学进步的不足,那么,一个人把这样的题目担当下来,加以处理,这种情况也是难以避免的了。正如一方铺路的基石,最可宝贵的是,它经受得住滚滚向前的车轮和沉重的步履。

二 文明的渊源

自从 1859 年达尔文的开雾睹天的《物种起源》一书发表

之后,世界上大多数知识界里的人都接受了生物进化的科学理论,承认人是从先于他而出世的某种猿猴类型的生物传代下来的。但在讲起人生的各种实际问题时,却又总有人漫不经心地把这个关系到人的生死存亡的大道理、大前提置诸脑后。

对于社会的约束程度上参差不齐的一些动物的社会行为,无论多么光怪陆离,多么循规蹈矩,多么不可思议,我们都会不假思索地认为,它们所恃的全属所谓的本能;而这些本能之所以取得,又都是通过自然选择对于种群的基因型进行取舍的结果,与后天的学习全无关系。对于人,则由于他具有高度发达的自我意识和理智的才能,不但能够意识到自己对于生活上的种种需要所引发的感觉,并且能够根据环境的变化加以各种程度的裁节,便往往生出许多以为人是超凡入神的荒诞的奇想。但是,我们的自我意识实际上并不能告诉我们自己的社会行为究竟是不是发乎本能的。对于这个问题,要作出肯定的回答十分困难,但要作出否定的回答则肯定需要更加慎重。因为我们毕竟已经知道人的一些不教而能的行为无疑是发乎本能的;其次,即使是在人生的各个阶段经过学习或社会规范才产生的那些欲望,行动起来往往也是火起水发一般要止也止不住的,如果得到满足,我们就会感到舒服和快乐,否则就会感到痛苦、遗憾、懊恼或羞愧;这与不学而能的欲望是否得到满足时所引起的感觉非常类似,甚至简直就是一回事。由此看来,把人类的任何一种社会结构或制度,除了其中涉及人的最基本的需要一点而外,都算作文化的作用,都只能就它的本身去“自谋解释”而和人的自然倾向风马牛不相及,在事理上便有一些讲不大通,在解释上也无法圆满了。

本世纪 50 年代以来,遗传学突飞猛进,使我们对遗传的

物质基础——基因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有了许多新的知识。在这种形势下,哈佛大学的昆虫学家 E. O. Wilson 教授等一些社会生物学派的学者主张:要真正理解人类的本性、人类的生活、以及他们所依赖的环境条件、法律、公道、道德性等等,必须对人的遗传基础,即人的基因有充分的知识;否则,在这类问题上的一切研究统统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有达到这一步,才能在理性上自觉领悟我们人类自己,达到黑格尔所称的人类发展的最高顶点。社会生物学派沿着这条路已经做了许多尝试,例如对一般行为,对利他主义和亲属选择等等问题的探讨;支持他们的人和反对他们的人都不少,双方的辩论正方兴未艾。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坚信,社会生物学一定能够最终解决诸如此类的古老而又困难的问题。社会生物学迄今所提供的具体结论的是非姑且不论,重要的是,他们参考到遗传学的日新月异的巨大成就,不畏艰难地把人的本性和人类文化的瓜葛问题承担起来,尝试某种程度的综合的解释。前途的演变我们难以预料;但可以相信,只要认真地继续研究下去,不论将来取得的成绩是大是小,都会有助于我们对囿囿的人的了解,有益于人类社会的健全发展,它们的价值也一定会是与日俱增而无法估量的。

同样是这个题目,本世纪的 30 年代潘光旦先生加以处理的时候,走的路子和社会生物学遥遥相望但又截然不同。他避开了具体讨论有关文化品性的基因问题而独辟蹊径,一面博览群书,研究历代掌故,一面缜密地观察人的现实生活和考察当代社会的各种制度;他希望从文化的传统和科学的进步中,对中华民族能够在当今的世界上乐业遂生的机制有所发明。

文化现象所凭借的遗传基因不但数量众多,无法鉴别,而且作用又极端复杂,几乎可以肯定绝非人力能够左右得了

的；它们是人类文明的本源。但是，这些基因的表型，即气象万千的人文现象，则多半是可以看得见和摸得着的。它们原本是人依据自己的本性发明出来而用于求生存的手段，但一经问世又往往喧宾夺主，转而把创设它们的人作为倾轧排挤、颐指气使、生杀予夺的对象，成为一种人造的严酷的生存环境，任何人面对它都必须知道有所顺逆和趋避，才能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用生物进化的眼光看，一方面人文现象具有天诛地灭般的自然选择的力量，俨然可以发挥其改变人的遗传本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它是人的遗传本性的产物，人的遗传本性的变化也无疑可以从根本上转移那些有关联的人文环境。不过，我们千万不可由此产生幻想，以为人力可以自由地驾驭和左右这两个方面或任何一方面的局势；它们和自然界的其它生物种类的进化一样，完全是一种以地质年代计的缓慢的随机过程。因此，一个人也好，一个民族也好，尽管有着高度发达的主观能动性，也只应该做而又只能够做到的就是在自然允许的限度内求一个位育或安所遂生之道了。实际上，人类全部的文明史所记载的就是这个寻求位育之道的经过，它始终是自然发展历史中有关人类的一章。

三 人生的依托

就体质而论，人是自然界中最不能自助和自卫的动物之一；“他的爪牙不足以自卫，肌肤不足以御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辟害，勇不足以却猛禁悍”；他的幼稚的儿童时期很长，尤其需要外力的扶持。人之所以能立足于自然界，全凭他们聚集成群，而群之可聚，所恃的正是他从生物进化中取得的各种社会性的本能，例如：同情心，乐群，互助，服从……等等。人首先要在一个适当的环境中营造一个社会，然后通过

它才能取得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生活必需品,才能抵御强敌和繁衍后代;社会是人生的依托和文明的摇篮。

人的最早而又最简单的社会,和其它社会性的动物一样,都是一些由近亲成员构成的群体,群体的大小完全由繁育的机制决定;它们在适应环境中表现出来的或优或劣的势态则以该群体的基因型频率为张本。人刚刚兴起便通过不断的迁移而遍布世界各地,这足以证明他是一个有着高度变异性的动物物种,在身心两个方面都具备广泛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但早期人类的种群不可能太大,而且由于受到自然地理条件的严格限制,迁移的过程势必艰难而缓慢。对于一个隔离状态下的小规模的人类种群,自然选择可以发挥出非常强大的作用,使他的基因型频率一代一代地发生变化。人的不同种族的外表形体上的差异,可以说全部是在这个时期或更早经由自然选择而达成的。这些外表形体上的特征对于早期人类适应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的生活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比较起来,人的社会性倾向和有关的心理才能则更加重要得多,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在早期人类的种群中,人的各种心理能力和社会性的本能一定会受到自然选择的更加强大的压力而不断改善,终于积累起大量的突变基因,获得了空前强大的潜在的能力,使营造规模越来越大的、文明日趋昌盛的社会成为可能的事件。在这个强大的潜能中,语言占有很大的分量。它是人从自然选择的取舍中得到的一种堪称华贵的品质。人能够用多音节的语言把自己心上所经过的一切形象和意念表达出来,又可以或多或少地理解到旁人用语言来表达的东西。使用语言是人赖以营造社会的重要的社会性本能,没有它,人的社会在规模上不可能超过猿猴类太多,文化云云则恐怕连旧石器时代的程度都够不上。语言是人营造社会的最基本的工具,它的生长和发育,它的生命,自始至终都

是约定俗成的,我们既不需要操心,也根本无法控制;人的一生都在不由自主地搬弄这个东西,就像蚂蚁和蜜蜂筑巢造窝似的。

任何一个人的种群,如果他的多数成员有了高度发达的社会性的本能和特别善于使用语言,便会处处表现出对本种群的忠诚和同情心,彼此爱护,相互帮助,又且能为大家的利益牺牲自己。这样的种群,一定会在和其它表现较差的种群的不时进行的生存竞争中取得胜利,从而繁殖下更多的人口,兼并和融合其他的种群。因此,他们就有了更大的基因库来从事发明和改进工具、武器,优化觅取食物的方法和保全自己的谋略等等。一句话,通过自然选择,人终于有可能靠自己的努力去达到一个他常常自诩为“万物之灵”的高度,能够靠自己的文化的力量,在自然允许的范围内无限扩大自己的社会,并且通过它来和不断变化着的环境取得和谐,求得自身的生存。

随着种群的兼并融合,不同的文化势必也在不断地更新,终于形成若干大小不等又各有特色的文化中心,造成种种传统的文化势力。种群的基因库随着社会的扩大而更加丰富,基因型的频率终于达到某种相对稳定的状态。由这些基因型构成的传统社会,通过社会结构和功能的分化和专化而日趋文明和健全。但是,人和其它各种社会性的动物一样,他们的各种社会性的本能只施惠于他所认同的属于自己的社会的成员,从来不引申和扩大到同种的全部个体的;这是一种自然的倾向。先进的文明社会虽然可以借助文化的势力把所有早先属于其它种群的成员包括进来,又可以通过人的理智能力,利用教化的力量推波助澜,使人的社会性本能由习惯而得到加强和扩充,但是,文化势力和教化的力量所达到的人是流品不齐的,不同的人,在社会性的本能和理智的能



力方面可以有很大的差别。一头是至仁至义,可以为了他人,为了国家民族,甚至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而牺牲自己;另一头则是终身六亲不认,对任何人都不同情,他一个人就是一个社会;这中间的部分,社会性的本能所指向的范围,宽窄的参差变化十分复杂:有的人只能达到由血缘联系着的家庭、宗教,按居住地划分的大小同乡,由社会经历相同结成的各种社团,由私利凑合而成的各种江湖帮会,乃至本来是文明社会中由于分工而形成的行业,阶级和权力集团,都可以被一些人误认为是社会的极限,再也超不过去;在趋向至仁至义一端的,不论他们居住在哪里或者社会地位有何不同,他们的同情心和恩爱等等的社会性本能都能不同程度地指向更广阔的天地。无论如何,对于社会认同范围之外的人和事,他们很难摆脱冷漠、戒惧、甚至敌对的情绪,结果势必只能保持趋利避害的一种关系了。在一个统一的文明社会中,潜在着无数实际上不能独立存在的畸形的小社会,这是人类进化的漫长而坎坷的历史留下的烙印和沉重的负担。它是文明社会中到处游荡着的鬼影。社会既不是少数人可以凭借自己的幻想和滥用自己的意志来任意摆布的“江山”,也不是什么凌驾于人之上的“势力尊者”,可以用它自己规定的“制度”来任意钳制和摆布人生的。人的自然历史决定了人离不开社会,只是因为社会是人的自然本性的需要,是人求生存的根本手段。蜂巢蚁窝一旦被毁,失群的蜂蚁如果不能重建窝巢就只有死亡的一途;如果人赖以生存的社会一旦瓦解了,作鸟兽散的人就会不由自主地在遗传的社会性本能的驱策下,凭借各人自己的情理的亲怀和先前的文化修养,趋利避害,通过认同重新营造自己的社会,这是惟一的听天由命的活路;那些无可认同而又对重建自己已经习惯或理想的社会绝望的人,以及那些自认为被社会抛弃了的人,他们的社会性本能

都被窒息而苦闷之极，不少人甚至用自杀来做最后的抗争。

四 凑巧的人生之舞

潘光旦先生在《文以载道》一文中有一段话，他说：“我们以为道就是人生……，《中庸》开头的几句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性是人生的根源，道是人生的表现，教就是文化，所以帮表见的忙的；换言之，性是人生的体，道是人生的用，教是此种用的剪裁润色。人生是一种功能，这功能原是自然的，但如完全任其自然，便不免始终在一个朴野的状态之中，而与其它动物没有多大分别，所以要剪裁润色，事实上剪裁润色的动因与力量，也就是道的一部分，所以有到人生，这种剪裁润色的努力也就自然会发生。不过剪裁润色的动力虽由自然供给，而剪裁润色的限度，除了死亡的一道界线而外，自然似乎并没有供给，至少并没有直接供给，而是间接的假道于人的情理的能力来供给的。因此，就全部人类文明史看来，这剪裁与润色的权能好像是完全在人的手里，与自然很不相干；人类自己不察，也以为这权能真是他自出心裁的东西，往往不免滥用，结果，不是剪裁过度，便是润色过度，渐渐地从修道的局面，形成一个害道的局面，形成一个尾大不掉，危及人生的局面，其最终的结局是死亡，那就到达上文所说的自然所供给的最后的限度了。人类的文明史事实上只是若干民族的文化史，民族文化盛衰兴亡的数见不鲜，我认为要从这一方面来观察，来解释，方为最近情实。”

修道固然前途无量，没有止境；但害道要害到文化窒息人生死亡的结局，多半也是迁延却期，苦海无边就是了。“修道”和“害道”，在不危及人生的限度内，事实上都是可以有很大的游刃的余地的。社会的前途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

人。

人对基于通性的生、养、教和安全的需要，以及完全是基于个性的对基本需要的修饰和种种稀奇古怪的渴求，都要通过社会才能得到满足；所以，营造社会是人人都不由自主地积极参加的集体性的行为。如果把人生看作一种艺术而将舞蹈来比喻一个人一生的活动，则社会便是一部人生之舞的总谱。它用语言、文字、器用、建筑、制度、废墟，乃至山川草木等等一切和人生有关的事物作符号，记录了人从诞生至今的种种往事。从散漫无序的人生片断，演变成为有规有序的文明社会，压根儿就是一个任运的、随机的事件。这真叫人难以置信；但是，只要我们看一眼热力学所探讨的宇宙，想一想包括人在内的物种的起源，对这种机缘凑合的大自然的神功鬼斧的奇妙也就不会感到太吃惊了。

文明社会中的亿万苍生，在遗传和教养上流品不齐，各人的活动对于人生的价值，从至恶的害道一端，到至善的修道一端，中间存在着无数的差别。修道和害道共存，是非妍媸难辨；即在一个人身上，也多半有似“修”似“害”泾渭难分的情况，只是“修”“害”两者的分量比例不同罢了。修道或害道是对人生位育是否适当的一种描写；人生的环境变化无常，时过境迁，是非妍媸的评说，前后又可以差别到至于完全颠倒的程度。由此发生的社会问题遍及人生的一切领域，人人都要使出浑身的解数来对付它们。但对付的结果往往是，一波虽平，一波继起，曲突徙薪，焦头烂额。

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代，问题的性质和轻重程度尽可以不同，但每个民族和每一个人的寻求位育之道的这番艰难的景象，则是万古不变的。这是社会成员的流品不齐和环境时事的多变造成的一种自然的格局。社会文化的多样性是人在这种自然格局中位育的结果；它不但使人生丰富多彩，而

且是保障社会能够及时应变和比较顺利地度过各种危机的力量的源泉。

由于当今人类社会的基因库非常庞大，基因型频率又相对稳定，我们没有多少理由去耽心文化的先天根据的不足或丧失。但是，具体的人才问题则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都是迫切而不能掉以轻心的。文化的盛衰由于人才的消长始终是一个大家都容易承认的事实。我们的社会的健康发展，归根到底是建筑在这些人才的修道的努力上的。一个有活力的社会，一定要时常有一些不随俗而比较奇特的新事物发明出来。关心这些新的事物，爱护发明这些新事物的人才，就是促进民族得其位育的基本手段；它使我们能够比较顺利地与环境保持一种积极的和比较持久的协调的关系。

凡是人才都是有先天的根据而表现出鲜明的个性。一个有才具的青年，若是没有发展的机会而受到淘汰，那就算是完了，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人可以出来替代他的了。严格地说，除了同卵双生的个体之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两个人的基因型是完全相同的；每一个人的活动必定都有自己的个性，并非只有人才才具有个性的。我们不妨说，就才能而言，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可以被另一个人代替的。

任何新的事物，究竟是修道还是害道，往往要经历一番或长或短的社会实践的考验才能比较容易被人认识。因此，爱护人才必须尊重个人，而且肯定要容忍某种程度的害道现象。尊重个人对人生的剪裁和润色的权利，是增进社会活力和保障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它是新人文思想着眼于人生的一种价值观念，也是新人文思想主张做人要兼顾人的通性和个性的健全的人格标准。它和强调个人自由与崇尚自我等等从权利义务观念出发的个人主义是有明确的界线的。

五 促进人类位育的教育

潘先生在《说乡土教育》一文中有一段话说：“一切生命的目的在求所谓‘位育’。这是百年来演化论的哲学所发见的一个最基本最综合的概念。这概念的西文名词，我们一向译作‘适应’或‘顺应’，我认为这译名是错误的，误在把一种相互感应的过程看作一种片面感应的过程。人与历史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都是相互的，即彼此之间都可以发生影响，引起变迁，而不是片面的。说历史与环境完全由人安排，是错误。说历史与环境完全支配着人，也是错误。近来常有人说到‘历史的必然性’和‘潮流必须顺应’一类的话，不止当看法说，更当做金科玉律说，显然是犯了后一种错误，而此种错误的责任，我认为至少有一部分要归‘适应’或‘顺应’的译名负担。……在中国人的生活经验里，‘顺应’那个错误的译名所代表的概念我们早就叫做‘位育’。《中庸》上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后世注经先生又加以解释说‘位者，安其所，育者，遂其生’，安所遂生，是谓位育。任何事物能安所遂生，能位育，岂不是恰恰可以代表演化论中那个译错的概念。同样一个译名，顺应或适应给我们一个错误的看法，即总像人在迁就，而历史与环境不是屹然不动，便是颐指气使的向人作威作福；位育则没有这些毛病。”

人类的光彩夺目的文明并不是一开始就现成地被安放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事实说明，人的自觉主动的努力通过位育，毕竟在其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文化是人生得其位育的不二法门。人类创造文化的才能

肯定可以遗传,但文化本身的信息则肯定是不能通过人的基因而遗传的。文化的信息只能通过包括教育在内的广义的教和各种媒体,一地一地的传播和一代一代地嬗递。人从出生的一天开始,一切位育活动都离不开制造和交流文化的信息。

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是在时空上没有限制的囿囿的人,但所有的人又无一例外地在现实生活中受到时空的束缚。教育作为一种工具,它可以帮助人在摆脱时空束缚的条件下,去获得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的文化的信息,促成人生良好的位育。

潘先生从新人文思想的立场出发,在教育问题上的种种主张,总括起来说就是一句话:教育要使受教育的人做一个“人”。

人之外的一切东西,包括人所创造的一切文化,都可以归列为物的范畴。神道、理想、科学、民主、艺术、社会、国家、政党、金钱等等,都是人所设置而为当今的人生服务的工具。如果把工具或物当作偶像,再把它移置过来当作教育的目的,那就是为事物而教育;事物成为人生的目的,人便势必成为奉承此目的的手段和工具,成为崇拜物的所谓拜物“教”的教徒;这样一来,人的情理便趋于泯灭,逐渐变成丧失了人的位育能力的野兽。只要瞥一眼社会上种种私欲横流的腐败现象,便不难想象出如果教育以物为目的会是多么荒谬的了。

历史上,以物为目的的教育恶例,无一不是摧残人生的。西方历史上曾经普及的为神道而教育,如今只有宗教家主张了;中国封建时代以“忠君爱国”和“光宗耀祖”为目的的科举教育,也已经成了明日黄花。但是,对于换一个名堂,以现代的某种事物为目的教育,则由于各种利益的或认识上的分歧,各方面的意见便大有不齐了。

以人为目的的教育,根本上就是每一个人的品格的培养,使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何以为人。人格基于人性。人从进化中取得的种种遗传的品性是人性的基础。其中包括人人都有而彼此相同的通性;人人都有但彼此相异的个性;以及男女有别的性别。人生有各种各样的需要,其中有的基于通性,有的基于个性,有的基于性别。一个人要得其良好的位育,必须对自己身上基于人性的情理和生活需要有比较明白的认识,使它们在人生中比较有效地发挥作用,而在发挥作用的同时自己又能加以有力的节制。这种自知自胜的境界,就是新人文思想眼光中的健全的人格;单纯依靠一个人在狭窄的时空条件下获得的经验是很难达到、甚至无法达到的;必须经过良好的教育才能养成。

关于人性的了解,目前科学所还不能给我们的,以往人类所累积的经验则肯定能。前文说到的人生之舞的总谱,也不妨说是一部关于人性的百科全书。潘先生提倡通才教育,用意就是要借助这部人性大全,使受教育者能够从人类的经验中了解到古往今来的人的情意知行,以促进他们对于人性及其在别人和自己身上的表现的了解。这里面,有搔着基本人性的痒处的文学和艺术;有可以为处世之“鉴”的历史、有可以晓示情理的哲学;有可以培养人的风度情趣的科学;还有前人对于环境中的事物在情绪上有过的反应,以及对于七情六欲的触发曾经作过什么样的有效的控制等等。通才教育应该使我们可以从人类的历史经验中了解到人的通性,人和人之间,不论在生活上如何大异其趣,各不相谋,但在情理上仍然有许多地方可以相会,可以交通;同时它也可以使我们体会到人的鲜明的个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上和生活的多元化对于人生的位育有着何等重要的意义。

人性大全中记录下来的人生的经验,泥沙俱下,分别成

为各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其中当然不乏人生已经证明了的真知灼见,但那些偏蔽不良的错误的东西也不是轻易就能发见和淘汰的。在这种局面下,由于各人在情理能力上的遗传差异和因学养而成的习惯不同,他们从传统中受到的熏陶便因人而异大有不齐了。

潘先生说:“……人人既有此三部分的人性,人人即不能无一种要求,就是此三部分的并重与协调的发展,发展的过程就是教育。发展的结果是每一个人的共同中自各有其别异的人格。……如此发展而成的任何一个人格,各在其可能发展的程度以内,可以有其宗教信仰,有其艺术欣赏,有其科学认识,有其政治见解,有其爱国爱家的情绪、民胞物与的意识,有其学术的兴趣,有其就业的技能,即或在若干方面,因天赋特长而宜乎略作偏重,在若干其它方面,因天赋不足而不免稍有偏枯,亦无害于生活的‘以群则和,以独则足。’”

每个人在青春发陈的时期,自我意识和主观能动性的发育都会突然旺盛起来;这时往往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些强烈的心理活动和前所未有的行为;一面渴望了解环境,一面渴望认识自己;面对未来,都盼望能够有所发明和创造,得其良好的位育。由此可见,要养成健全的人格本来就是人的一种本能的或自然的需要。所以,养成健全的人格的教育也是非在青年时期内进行不可的。

潘先生说,青年人的心理有四个特点:一是易于接受外界的刺激与印象;二是富有想像力与理想;三是易于唤起情绪与激发热诚;四是敢作敢为而无所顾忌。这原是人生最可宝贵的四个特点,生命的尊严,文化的灿烂,都从此推演而出。但这四个特点如果发挥不好,调节不当,也可以有变得流放、胶执、消沉、乃至渐灭的危险。反思我们过去的教育,无论是方针上还是具体实施上,都是非常偏重于物而忽略人的。